

习近平文化思想

学习专栏

新媒介语境下,发展文艺应把握的四对关系

□彭文祥

- ◆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既要重视创作的数量,更要注重作品的质量
- ◆在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上,要强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
- ◆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上,既要善于利用技术,又要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泥淖
- ◆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要在提高中促进普及,在普及中实现提高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新的媒介语境下,文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借助新媒介得到了更多样的转化,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网络文艺全方位地快速生长,在丰富实践中折射时代进程,在创新发展中凝聚审美特性、在品质提升中彰显影响力。特别是在文艺形态上,网络文艺不断拓展边界。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网络综艺等“典型形态”,文艺短视频、网络音频、网络直播等“泛化形态”都蓬勃发展着。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文艺创作与传播更是呈现出崭新的格局。人机互动,让创作的主体变得更加复杂。借助AI的力量,创作量呈现几何级的增长。与此同时,文艺作品的跨媒介转化与传播变得更加便利、频繁。

我们应该欣喜于文艺在新媒介语境下所展现出来的丰沛活力。多部长篇小说和《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通过网络直播抵达了更加广阔的读者群。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陶三圆的春夏秋冬》《滨江警事(第1部)》《我们生活在南京》(网络文学)、《漫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网络剧)、《特级英雄黄继光》《浴血无名·奔袭》(网络电影)、《我们的赛场》(网络纪录片)、《中国奇谭》(网络动画片)、《声生不息·宝岛季》(网络综艺)等被授予“优秀作品奖”。伴随实践的丰富展开,网络文艺领域已经形成了主体多元、竞合有序、生机蓬勃、效益显著的产业生态,并在生产机制、经营模式、盈利方式等方面展现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更重要的是,数亿网民借助AI等技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具有爆点的作品,彰显了不同时间点的社会情绪。这些都说

明,庞大用户规模蕴含巨大创新潜能,展现了新大众文艺的蓬勃生机和典型风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者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时代发展同声相应、与社会进步同气相求,在题材选择上回应人民所需,在思想开掘上勇立时代潮头,在表达形式上大胆创新创造。面对新媒介语境带来的新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丰富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着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要正确对待并处理好以下四对重要关系。

一是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既要重视创作的数量,更要注重作品的质量。一般说来,哪个领域聚集的人才和能量越多,这个领域涌现的作品就越多。作品数量多,就奠定了厚实塔基,为精品力作的涌现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不是说,作品多了,精品就会自动出现。这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沉潜其中,不断深化对现实社会和时代生活的思考。当前,在如火如荼的创作生产中,特别是在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游戏等的创作生产中,要克服内容同质化、类型跟风、模式复制等弊端,强化创新发展,推出更多有现实感、有生命力的作品。实践表明,优秀的作品,既要能给受众带来审美的愉悦,又要能在情感、思想上形成感染与冲击,并能激发其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

二是在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上,要强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在文艺领域,作品创作出来,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因此,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对于文艺事业而言,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一部作品出来,完全没人在意、没人关注,那么,它的价值也难以真正实现。当然,我们也要警惕唯点击率、唯流量、唯收视率、唯票房等负面情形。创作者不能为了所谓“流量”,在作品中渲染一些低俗的感官欲望和虚假的情感,而要在艺术创作中坚持求真、崇善、尚美。在创作态度上,要注意“观众本位”与“迎合观众”的本质区别。实践表明,前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彰显了文艺的人民性;后者则常常在貌合神离中扭曲、异化大众的审美需求,甚至让庸俗、低俗、媚俗内容冲决理性的界河。

三是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上,既要善于利用技

术,又要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泥淖。大数据、云计算、VR、AI等科技革新、发展有益于激发创意灵感、创新文艺形式、拓展艺术空间,但技术的误用、滥用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算法推荐在提升用户黏性的同时,也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并带来用户视野固化、反思批判能力下降、知识鸿沟加深等问题。再比如,AI对于人类的创作是很好的助力,特别是在资料收集、灵感激发等方面带来诸多裨益。但是,艺术创作不能完全陷入AI的理性逻辑之中,丢掉感性的创造力和审美的丰富性。实践表明,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过度迷信技术手段的迭代翻新、片面追求感官体验的绚丽夺目而罔顾艺术的规律、审美的价值,显然不利于文艺的繁荣发展。

四是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要在提高中促进普及,在普及中实现提高。新媒介文艺的蓬勃发展将普及和提高两方面的工作更好地结合了起来。正是因为大众艺术、大众文化的普及,人民群众提高了文艺审美与创作能力。与此同时,在广泛参与艺术创作、审美接受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进一步推动了艺术普及的实践。在新媒介语境下,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是合二为一的。但是,新媒介文艺要进一步发展,终究还是要产出真正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精品。在这种意义上,“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普及”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仅关乎新媒介文艺的健康发展,更关乎新媒介文艺的功能发挥。

总的来说,在风生水起的发展浪潮中,我们既要看到新媒介文艺蕴含的澎湃创造动能,又要直面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符合艺术规律、传播规律和市场规律的精品化生产,将“高质量发展”贯穿新时代文艺实践的全过程。在“十五五”即将启航之际,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在未来的实践中,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主体性,以更多精品力作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我们正处在一个被数据、流量和热搜深刻影响的时代。在文艺领域,“爆款”似乎已经从一种结果性的荣誉,演变为一种前置性的目标。打造爆款的呼声,前所未地影响着创作的生态与走向。然而,当我们冷静回望一些由资本与算法合力营造的流量狂欢时,不禁要问:这些爆款,真的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文化选择和心声吗?

流量的本意,是人气的数字化呈现,本应映照千百万观众与读者的兴趣与情感共鸣。从这个角度看,它似乎天然地与文艺的人民性相契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23年就曾用“网络热词热度”来分析“人民文化实践”。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新时代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反复强调的,文艺必须服务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流量似乎成为最直观的反馈之一。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正在拉开一道值得警惕的裂隙。

当下的爆款生产,与其说是大众自言,不如说更像是一份预设的菜单。业内评论普遍指出,如今的创作往往被迫迎合一些固定模式,比如快节奏、高密度、强情节、强刺激、多反转等。这样的创作逻辑,逐渐将艺术异化为元素的拼接和套路的堆砌。许多作品从立项之初,便不再追问“我要表达什么”,而是盘算“怎样才能冲上热搜”。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披着科幻外衣却缺乏科学与人文思考的故事,本质上仍是打怪升级的重复;也看到一些改编作品,为制造冲突不惜背离原著精神,将“共同成长”的核心主题改为“反目成仇”的狗血剧情,最终引来观众和市场的双重抵制。这种模式看似迎合观众,实则低估了观众的审美与判断,消解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社会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流量生成机制,正加剧流量与民意的错位。人民性不仅包含“为人民所喜爱”的形式,也包含“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愿望”的内容。然而,在资本和平台的强势介入下,“为人民所喜爱”逐渐被“能带来流量”取而代之。在“有流量就有销量”的观念影响下,一些机构不再依靠作品质量与口碑的自然积累,而是将赌注押在作者的粉丝效应,甚至刻意制造噱头,而作品本身的价值反而被边缘化。这种本末倒置,使流量不再是民意的真实映照,而更像是一场经过操控的商业游戏。其后果是,IP的长久生命力被透支,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信任被侵蚀。

面对爆款的诱惑,文艺工作者应当如何选择?或许仍然在于回到创作的本源,坚守初心,坚持创作的主体性。真正的爆款,应当是精品力作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投机速成的目标。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它扎根现实生活,又高于生活;它能触动人心,启发思考,因而获得持久的共鸣。这样的作品,即便不刻意追逐热搜,其内在的真诚与力量,也足以穿透喧嚣,赢得人民喜爱。反之,那些依赖拼贴与套路的产品,即便昙花一现,也必将因空洞而被遗忘。尤其在今天,当人工智能已经能够批量生成平庸之作时,人类创作者的价值恰恰在于那些无法被量化、无法被复制的独创性与深度思维。

因此,我们必须重申对人民性的深刻理解,妥善把握艺术专业性与作品传播度的关系。坚守艺术追求,不等于孤芳自赏;贴近大众,也不意味着无底线迎合。真正的人民性,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感受时代的脉动,用专业的艺术手段将其提炼和升华,创作出既有思想厚度又有情感温度,能够与广大人民同频共振的作品。这需要创作者具备足够的文化自信和艺术定力,不为短期流量所左右,敢于对“预制菜单”说不。

流量可以是尺子,但不能成为唯一的尺子。在爆款迷思的喧嚣中,无论是创作者、评论者,还是整个行业,都需要保持清醒。唯有回归初心,扎根人民生活,以“传世”而非“爆款”的标准去雕琢作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才能让文艺的百花园盛放出属于人民、并能被时代铭记的花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锐评·锐见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汇报

合办

爆款应是水到渠成,而非投机以求

□意娜

打开理解抗战时期中国美学的新视野

——评金浪的《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5)》

□崔文骏

金浪的《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5)》(以下简称《再造传统》)出版于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夕,将“战争状态”下中国美学的丰富图景再次带入读者的视野。近年来,抗战时期文学书写和作家精神历程备受学界关注,涌现出一批富有新意的成果,该时期的美学研究相较于此前则较为寂寥,究其原因,人们一面习于在“启蒙”视野中理解美学这一“舶来品”,一面又普遍将“中国美学”视为更为晚近的产物。《再造传统》以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三个生动的个案有力证明,“救亡”时代的美学话语不仅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使命,更奏响了绵延至今的诸种讨论的“前奏”。在此意义上,《再造传统》并未止步于战时美学的历史描述,而是通过重审特殊时期的“美学中国化”和“中国美学化”,为理解中国美学的知识生成打开了全新的空间。

作为文化抗战的中国美学

1937年,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演讲时强调:“在战争中两国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言恰可代表三位知识背景各不相同的美学家在抗战时期“再造传统”的共同动力。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美学怎样与“民族精神”相联结?“民族文化”复兴的道途中,美学处于何种位置?这是时代赋予所有美学家的共同课题,也是此书强调“战时”视角的焦点所在。

通过三位学人战时迁徙和社会参与的全景回顾,《再造传统》将书斋内外的美学论著和文化

实践勾连起来,引领读者回到文化抗战的紧迫氛围中,一同领略美学话语演变背后炽热的现实关怀。此书讨论的对象中,既有以朱光潜《诗论》为代表的学术经典,亦有如《谈修养》等美学家撰著的面向社会的通俗读物,还包括李长之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宣言”体文章。无论是透视美学专著版本变迁中的幽微心路,抑或是洞察时论文章中潜藏的美学思维,都成为此书重探战时美学文化想象不可或缺的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别关注美学话语的“内部运动”:战时的需求带来了美学话语朝向传统的整体性“转折”,但这绝非偶然的突变,而是依赖美学家对不同资源的吸收、融汇与转化,其中存在待仔细辨认的历史逻辑。正如本书绪论提到,晚清以来王国维、梁启超、梁漱溟都曾试图“将美学视野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只不过这一面向在以“社会改造”为主潮的时代并未充分开展。直到战时,现实的重任才让中国美学的文化建构取得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当文化抗战以胜利作结,美学家们的足迹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持久影响。关于美学“中国性”的讨论已被激活,“再造传统”的努力在几代美学家中延续,彰显着中国学人追寻文化主体性的信心与风采。

重焕生机的传统

《再造传统》中三位美学家的学术道路皆以“反传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展开,却在战时以“再造传统”为己任。若不能充分意识到“再造”与“恢复”之差别,便注定无法深入他们的

精神世界。该书绪论援引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指出,传统“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传统之所以能够乃至必将被“再造”,正以“未完成性”为根基。战时美学充分发现且利用传统的“未完成性”,在传统与当下之间建构起紧密的联系,才让传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潜能,同时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为了甄别战时美学“再造传统”的多元路径,该书对一系列首次被运用于中国文化的新概念、新范畴进行了“知识考古”。如在第三章中,作者发现“写实”“浪漫”“古典”三个范畴共同构筑了李长之重释传统的思想体系。它们并非来自传统本身,而是源于其“文艺复兴”构想的西方“模版”,其中18和19世纪之交德国思想家的启发尤为关键。李长之把孔子和屈原分别奉为“古典精神”和“浪漫精神”的代表,并质疑“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缺乏对“孔子的真精神”的认识。饶富意味的是,李长之批判今文经学“迷信”、古文经学“支离”、宋儒“空谈义理”,这与“新文化”主流的思路并无二致。而他所看重的“深厚”“热烈”的“真精神”,实质上就是理想主义、非功利的“古典精神”。这种被建构的“古典”充满了“现代”基因。

除新概念、新范畴外,诸多“古已有之”的概念之“新生”也在该书中得到细致辨析。由于这些概念的“现代版本”已经被学界广泛接纳,人们往往对其含义的古今之别习焉不察。追问“新生”所依赖的方法论基础,是该书为理解“美学”与“中国”之磨合所作的又一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第二章对宗白华战时美学中“意境”概念的探讨。作者指出,宗白华之所以“打捞”出这一概念,乃是为了勾勒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差异,并从中提

炼出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原理。经过重构的“意境”概念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成为宗白华构筑“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重要基石。

美学概念体系的创造性重构必将引向传统的整体性重估。从宏观层面揭示诸种“再造”路径的价值和限度,是本书“知识考古”之指向所在。例如,作者从朱光潜战时繁杂的论述中抽绎出“以情释儒”这条核心线索,并将其放入近代中国“儒家审美主义”的思想脉络中确认其“前所未有的高度”,便点出了其“再造”思路的开拓性意义。战时美学家对“何谓传统”“传统的长处何在”进行了富有理论勇气的创造性回答,为今日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经验。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古今”问题始终与“中西”问题密不可分。抗战时期的文化重建,同时也伴随着知识分子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该书以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概念探察战时美学的思想构造,凸显出战时美学的文化政治意涵。战时美学家之所以不满于单向度的模仿和转述、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龃龉分外敏感,又对中西艺术、哲学的比较用力甚深,皆与嵌入美学“地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辨紧密相连。

纵观全书,普遍性与特殊性并非美学家被各自贴上的标签,作者力图呈现的是二者的转化、对抗关系及“交错状态”。中国现代美学的关注点从美的普遍性逐渐转移到特殊性,包含着抵抗西方霸权的努力;而新的文化想象成形的时刻,便是特殊性向普遍性迈进的起点。如该书绪论所

言,中国知识人对普遍性和特殊的综合,也是德国等后发现代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作者强调,在美学学科逐渐“中国化”的同时,中国也在战时走向了“美学化”——美学话语催生了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新认知,“美学中国”的知识形态随之浮出地表。三位美学家的“传统再造”,既折射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又深化了“中国美学”和“美学中国”的相互联结。

抗战即将结束之际,宗白华曾言:“我们并不希求拿我们的精神征服世界,我们盼望世界上各型的文化人生能各尽其美,而止于至善,这恐怕也是真正的中国精神。”这清晰展示出“传统再造”所包含的未来向度:美学家并非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展开想象,而是通过重新认识本国文化来思索中国可能为全人类所作之贡献。“传统再造”表面上以中国为对象,实则蕴含对人类文明前行方向的反思。作者重读宗白华的“中国精神”论述发现,美学家普遍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各自“往哪里去”是无法分割的问题,偏于“艺术”与“科学”一端都不足以解除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宗白华高远的文化理想并非孤例,显示着中国知识人从被动“融入”/“适应”到追求“改造”/“引领”世界潮流的蜕变。

得益于“再造传统”的战时遗产,今日“美学中国”正如三位美学家所期许的那样,在民族复兴的道途中绽放光彩;“中国美学”知识体系的构筑亦成果丰硕、日趋完善。该书的历史回顾不仅还原了影响深远却未被充分观照的思想历程,更为思考当下学者的处境与使命提供了鲜活的参照和启示的源泉。

(作者系重庆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